

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

通

胡适作品系列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胡适谈治学方法

胡适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胡适作品系列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胡适谈治学方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胡适谈治学方法/胡适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3

(胡适作品系列)

ISBN 978-7-301-23662-8

I. ①有… II. ①胡… III. ①胡适(1891—1962)—治学方法 IV. ①G7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1429 号

书 名：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胡适谈治学方法

著作责任者：胡 适 著

责任编辑：张文礼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3662-8/I · 2697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pkuwsz@126.com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15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32 开本 6.75 印张 158 千字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出版说明

胡适是20世纪中国最具国际声誉的学者、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文、史、哲等学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五四”以来影响中国文化学术最深的历史人物。他活跃于社会政治领域，是中国自由主义最具诠释力的思想家。他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欧美国家荣获三十五个名誉博士学位，是最具国际影响的中国学者。胡适生前在北京大学从事教学工作时间长达十八年之久，曾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校长等职。他对北大情有独钟，遗嘱中交待将他留在大陆的书籍和文件捐赠给北大图书馆。为反映这位文化巨人一生博大精深的文化建树，本社在北大百年校庆的1998年曾隆重推出一套大型胡适作品集——《胡适文集》（十二册），对所收作品均作了文字订正和校刊，其中有一部分作品，采用了胡适本人后来的校订本或北大的收藏本，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受到学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

因早已售罄，多年来，一直有要求重印的呼声。此次重印，此套书的编者著名胡适研究专家欧阳哲生先生又精心做了许多工

作，包括对照已出各种版本的优长，重核胡适本人原始和修订版的文字等，力求呈现最接近大师本人原意的文字面貌。为方便读者阅读，我们从《胡适文集》之中精选部分内容，另外推出“胡适作品系列”。

在治学方法上，胡适深受其师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影响，将其归纳为“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中指出：“他们用的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总之，“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本书收录了胡适谈治学方法的代表性文章。

由于所处环境不同，研究视角与方法不同，因此本书对某些具体问题的描述和解释，与内地通行的说法有不尽相同之处，对这些说法，我们未作删改，这并不代表我们完全同意作者的说法，请读者在阅读时认真鉴别。本书的人名、地名、标点等，有的与现行用法不同，为保存原貌，亦未加修改。

限于编辑水平，难免存在错漏之处，欢迎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目 录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致罗尔纲	/ 1
治学“四字诀”——复陈之藩	/ 4
治学的方法与材料	/ 9
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	/ 25
整理国故与“打鬼”——给浩徐先生信	/ 40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 52
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 72
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 85
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 120
《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	/ 173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1]

——致罗尔纲

尔纲：

我在《史学》（《中央日报》）第十一期上看见你的《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很想写几句话给你。

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焘诸人可以随口乱道，他们是旧式文人，可以“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一类的胡说。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西汉务利，有何根据？东汉务名，有何根据？前人但见东汉有党锢、清议等风气，就妄下断语以为东汉重气节。然卖官鬻爵之制，东汉何尝没有？“铜臭”之故事，岂就忘之？

[1] 此信写于1936年6月23日。题目为编者所加。

名利之求，何代无之？后世无人作“货殖传”，然岂可就说后代无陶朱、猗顿了吗？西汉无太学清议，唐与元亦无太学党锢，然岂可谓西汉、唐、元之人不务名耶？

要知杨继盛、高攀龙诸人固然是士大夫，严嵩、严世蕃、董其昌诸人以及那无数歌颂魏忠贤的人，独非“士大夫”乎？

凡清议最激昂的时代，往往恰是政治最贪污的时代，我们不能说东林代表明代士大夫，而魏忠贤门下的无数干儿子孙子就不代表士大夫了。

明代官绅之贪污，稍治史者多知之。贫士一旦中进士，则奸人猾吏纷纷来投靠，土地田宅皆可包庇抗税，“士大夫”恬然视为故常，不以为怪。务利固不自清代始也。

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太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

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又在《益世报·史学》二十九期见“幼梧”之《金石萃编唐碑补订偶记》，似是你作的？此种文字可以作，作此种

文字就是训练。

偶尔冲动，哓哓至几百字，幸勿见怪。

适之

（原载罗尔纲《师门五年记》1944年6月桂林建设书店出版）

治学“四字诀”^[1]

——复陈之藩

之藩：

对不起！你的四月十六日的长信，我还没答复，你提出的问题太不容易答复。那是迟迟不答的真原因。

主要的说明是人性的不同，James所谓哲学的派别争论其实却由于有hard-minded与soft-minded两大区别。费密（明末清初人）也指出人“沈潜刚克”与“高明柔克”的两大类（但他加上“平康正直”[中行]第三类）。

同样重要，而稍次一等的，是每个人一生的训练，训练是“一言难尽”的，是“终身以之”的，是随时随地不可放松的，——所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平日的训

[1] 题目为编者所加。

练，一旦偶然放松，人的性情或早年先入的成见就无意中流露出来了。

例如，Sir Oliver Lodge治物理学，那是他的训练。他信鬼，信灵魂，那就是性情流露与他的训练没有大关系

我在《丁传》里（页五五——五九，九七——一〇七）（指出他的“宗教”见解，他用动物学知识来说明来证明！）他所谓“宗教”（即“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我曾指出他这个宗教见解，在无形之中，曾影响他对于苏俄革命及所谓“新式的独裁”的看法。这是性情的表现，其实同他的动物学与地质学无大关系。

我平生留意方法的问题，方法是可以训练的。这种训练正是我所谓“随时随地不可放松的”。你所说“胡先生的看法常常是无大误”，很可能的是这种训练的一点点成绩，也就是你所谓“由于你的谨严的精神”。

你曾看见我写给王重民的一封信吗？（曾发在抗战时期的《图书季刊》新五卷一期。）我在那篇短文里，曾用古人论从政（做官）的四字诀来说明“治学方法”。那四个字是“勤、谨、和、缓。”

勤即是眼勤、手勤——即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勤求材料，勤求事实，勤求证据。

谨即是一丝一毫不苟且，不潦草，举一例，立一证，下

一结论，都不苟且，即是谨，即是“敬慎”。

其余两字，同样重要，你好像不大注意到。“和”，我解作“心平气和”，解作“平心静气”，解作“虚心体察”。

（西方宗教所谓humility，其实并不十分humble，平心考查一切不合吾意的事实和证据，抛开成见，跟着证据走，服从人，“和”之至也。）

“缓”字在治学方法上也十分重要。其意义只是从容研究，莫急于下结论。证据不充分时，姑且凉凉去，姑且悬而不断（suspending one's judgment）。

所以我中年以来，常用这四字诀教人，常说，科学方法不是科学家独得或独占的治学方法，只是人类的常识加上良好的训练，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养成勤、谨、和、缓等良好的习惯，治学自然有好成绩。

现在可以谈谈你所谓“情感”、“真实情感”、“一团火”等等名件了。

因为我注意良好的工作习惯，因为我特别重视“和”“缓”两种美德（良好习惯），所以我很感觉“情感”“火焰”等等在做学问的过程上是当受“和”与“缓”的制裁的。

我所谓“随时随地不可放松”的训练自己，其中一个重要“场合”就是我常说的“正谊的火气”。我最佩服的两位近代学名，王国维先生与孟森先生，他们研究史学，曾有

很大的成就，但他们晚年写了许多关于“水经注疑案”的文字却不免动了“正谊的火气”，所以都陷入了很幼稚的错误，——其结果竟至于诬告古人作贼，而自以为主持“正谊”。毫无事实证据，而自以为是做“考据”！

其实现代许多赞成列宁、斯大林那一套的知识分子，他们最吃亏的，我想还是他们对于社会问题某方面的一点“正谊的火气”罢？

所以你说，读我的文字“连一朵火焰也看不见”这是很大的赞美辞，我怕很少人能承当。我是不敢承当的。

你说，清代三百年的考据时代“主要是因为不自由的环境下，不能由人随便说出真心的感情……”这其实是妄说，不可误信。考据的学风是两宋（北宋、南宋）就开始了的，并不是近三百年的事。欧阳修的《集古录》，司马光《通鉴考异》，赵明诚《金石录》，朱熹、洪适、洪迈，并不必“把情感压下去”，他们是考据学的开山人，因为他们生在学术发达时代，感觉有辨别是非真伪的必要，才运用他们的稍加训练纪律的常识，用证据来建立某些新发现的事实。这才是考据学的来源。

这种辨别是非真伪的热情，也是一种情感，并且是一种有大力量——也有火焰——的情感。

试读崔述的《考信录提要》或戴震的《孟子字义疏

证》，你一定会感到火焰的热力。

故我不赞成你说的“考证的路”确实是科学的，然而“并非健康的”。你仔细想想，那有“确实是科学的”东西而“并非健康的”！

你举的Einstein的故事，大概是不可靠的。Einstein是天才和训练和合的人物，但他在某些方面稍稍放松他的言论，就不足为训了。

不写了，祝你好。

胡适 一九五七，五月，二日

（陈之藩《在春风里》，台北文星出版社1962年版）

治学的方法与材料

现在有许多人说：治学问全靠有方法；方法最重要，材料却不很重要。有了精密的方法，什么材料都可以有好成绩。龚同溺可以作科学的分析，《西游记》同《封神演义》可以作科学的研究。

这话固然不错。同样的材料，无方法便没有成绩，有方法便有成绩，好方法便有好成绩。例如我家里的电话坏了，我箱子里尽管有大学文凭，架子上尽管有经史百家，也只好束手无法，只好到隔壁人家去借电话，请电话公司派匠人来修理。匠人来了，他并没有高深学问，从没有梦见大学讲堂是什么样子。但他学了修理电话的方法，一动手便知道毛病在何处，再动手便修理好了。我们有博士头衔的人只好站在旁边赞叹感谢。

但我们却不可不知道这上面的说法只有片面的真理。同样的材料，方法不同，成绩也就不同。但同样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绩也就有绝大的不同。这个道理本很平常，但现在想做学问的青年人似乎不大了解这个极平常而又十分要紧的道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有郑重讨论的必要。

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在历史上，西洋这三百年的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成绩；中国这三百年的朴学也都是这种方法的结果。顾炎武、阎若璩的方法，同葛利略（Galileo）、牛敦（Newton）的方法，是一样的。他们都能把他们的学说建筑在证据之上。戴震、钱大昕的方法，同达尔文（Darwin）、柏司德（Pasteur）的方法，也是一样的：他们都能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参看《胡适文存》初排本卷二，《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页二〇五——二四六）。

中国这三百年的朴学成立于顾炎武同阎若璩；顾炎武的导师是陈第，阎若璩的先锋是梅鹗。陈第作《毛诗古音考》（1601—1606），注重证据；每个古音有“本证”，有“旁

证”；本证是《毛诗》中的证据，旁证是引别种古书来证《毛诗》。如他考“服”字古音“逼”，共举了本证十四条，旁证十条。顾炎武的《诗本音》同《唐韵正》都用同样的方法。

《诗本音》于“服”字下举了三十二条证据，《唐韵证》于“服”字下举了一百六十二条证据。

梅鹗是明正德癸酉（1513）举人，著有《古文尚书考异》，处处用证据来证明伪《古文尚书》的娘家。这个方法到了阎若璩的手里，运用更精熟了，搜罗也更丰富了，遂成为《尚书古文疏证》，遂定了伪古文的铁案。有人问阎氏的考证学方法的指要，他回答道：

不越乎“以虚证实，以实证虚”而已。

他举孔子适周之年作例。旧说孔子适周共有四种不同的说法：

- (1) 昭公七年（《水经注》）
- (2) 昭公二十年（《史记·孔子世家》）
- (3) 昭公二十四年（《史记索隐》）
- (4) 定公九年（《庄子》）

阎氏根据《曾子问》里说孔子从老聃助葬恰遇日食一